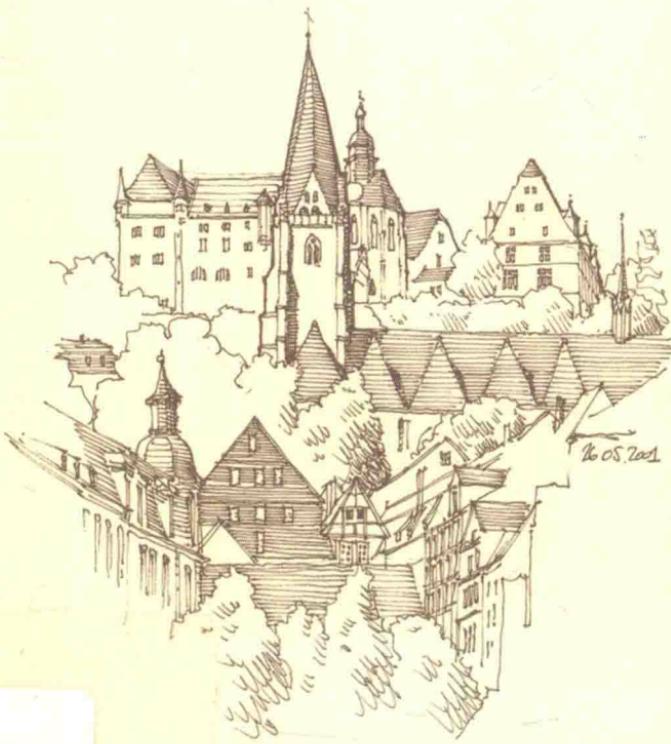


Chuchang Chayi Helixing

Wanqing Yilai Yingmei Xiaoshuo Fanyi Xingwei Yanjiu

出场 差异 合理性： 晚清以来英美小说翻译行为研究

徐剑 袁辉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Press

出场 差异 合理性： 晚清以来英美小说翻译行为研究

徐剑 袁辉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Press

内 容 提 要

本研究从场域理论出发,结合哲学研究的“同一性”和“合理性”概念,论证了晚清以来英美小说翻译行为的存在结构,并从三个维度对翻译行为类型进行了疏理。研究将晚清以来的翻译实践分为四个历史实践场域,对各个场域里的英美小说翻译行为进行了研究,总结了各个时期翻译行为规范的特点。研究指出,晚清以来的英美小说翻译行为规范发生了多次变化,某些翻译规范在持续的变动中逐渐消失,新的翻译规范则在变化中诞生。此外,在翻译行为规范的变迁中,翻译规范对译者的影响力和在翻译系统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一些翻译行为边缘化,另一些行为规范则演化为主流的翻译行为,并反映了时代的翻译价值判断。晚清以来英美小说的翻译行为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归化到异化再到归化的过程,语言规范也从文言翻译为主变换为欧化成风再到回归现代汉语规范。目前,英美小说翻译规范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本研究还通过“合理性”这个概念,从译者的主体性出发,建立了一个翻译行为的解释模式,从而使研究者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对晚清以来英美小说的翻译行为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研究最后提出了对晚清以来英美小说翻译的译事评价方法和译本批评原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场 差异 合理性:晚清以来英美小说翻译
行为研究/徐剑,袁辉著. —徐州:中国矿业大
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 - 7 - 5646 - 3230 - 4

I. ①出… II. ①徐… ②袁… III. ①小说—文学翻
译—研究②小说—文学翻译—研究—美国 IV. ①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3474 号

书 名 出场 差异 合理性:晚清以来英美小说翻译行为研究
著 者 徐 剑 袁 辉
责任编辑 万士才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解放南路 邮编 221008)
营销热线 (0516)83885307 83884995
出版服务 (0516)83885767 83884920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cumtpvip@cumtp.com
印 刷 徐州中矿大印发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41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对行为理论越来越关注,行为理论成为众多翻译理论的基础。现代翻译理论大多建构在某种行为理论上,比如描写翻译学是建构在规范行为理论上的,功能派建构在目的行为理论上,语用学的翻译理论建构在言语行为理论上。所有的翻译理论都包含着某种翻译行为观,比如交际行为、交往行为、转换行为、社会行为、政治行为、解决问题的行为等等。有些翻译理论体现的是重大的行为类型,比如许渊冲先生的翻译竞赛论,体现的就是四大行为类型之一的戏剧行为。因此,Neubert等人提出理想的翻译研究应当研究实际的翻译行为。

我们对翻译行为的研究始于十余年前对翻译行为合理性问题的探索,基本思想是译者的翻译行为是对翻译情境的理性反应。近年来,我们又在研究中引入了场域、出场、退场、差异、同一等概念,对影响翻译行为的各种变量进行了梳理,对翻译行为研究的维度进行了探究,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翻译行为研究维度。这些理论上的准备为我们研究晚清以来的英美小说翻译行为奠定了基础。《出场 差异 合理性:晚清以来英美小说翻译行为研究》是我们在这个领域探索的成果之一,我们希望通过将理论思考与翻译实践结合,一方面提供一个翻译史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能够为晚清以来的文学翻译研究尽一份力量。诚然,对百年来的英美小说翻译行为进行研究对我们是个巨大的挑战,研究中必然存在疏漏和不当之处,我们也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出场 差异 合理性:晚清以来英美小说翻译行为研究》始于

我们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0YJA740106,已结题)。由于工作变动,课题的后半程研究工作在中国矿业大学开展,著作的出版得到了中国矿业大学基础与新兴学科建设经费的支持。“实证翻译学”是我们着力发展的学科,翻译行为研究是本学科的研究特色之一。在此我们向所有关心支持本研究的专家以及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师范大学的领导与同事表示感谢。

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万士才老师为本书的编辑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作者

2016年10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翻译行为研究的意义	2
第二节 出场、差异、合理性：文学翻译行为的 三个存在结构	6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16
第二章 翻译行为的复杂性	23
第一节 翻译研究的三个维度	24
第二节 翻译行为的社会属性	32
第三节 翻译行为的物质属性	52
第四节 翻译行为的心理属性	60
第五节 翻译行为的多维属性	66
第三章 场域、翻译行为共识与翻译规范	80
第一节 晚清至五四时期的英美小说翻译实践	82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英美小说翻译实践	100
第三节 建国初期的英美小说翻译实践	132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英美小说翻译实践	155

第四章 差异化的同一：晚清以来英美小说翻译行为的合理性	182
第一节 晚清以来英美小说翻译行为的中观理解	187
第二节 晚清以来英美小说翻译行为的社会心理学考察	190
第三节 影响小说翻译行为的变量	200
第五章 晚清以来英美小说翻译行为的评价与批评	242
第一节 晚清以来英美小说翻译行为的有效性前提	242
第二节 晚清以来英美小说翻译的译事评价	248
第三节 晚清以来英美小说翻译的译本批评	254
第六章 结语	266
主要参考文献	270

第一章 绪 论

转眼之间进入二十一世纪已十几年，屈指算来，距晚清西方列强打开我国国门已超过一个半世纪，距五四运动也有近百年。一百多年来，中国在思想、文化上发生的变动或许是历史上最频繁剧烈的。中国社会从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绵长的封建专制国家，匆匆地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新世纪的开端，人们在规划未来发展的蓝图时，自然免不了要对过去的百年作一番回顾与总结，不仅期待从经验和教训中总结今后前进的道路和方向，更希望从中揭示出发展的规律。翻译研究自然也不例外。

过去的百年，我国的翻译活动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发展环环相扣。一般认为，中国翻译在新中国诞生以前经历了三次高潮：一是汉唐时的佛经翻译，二是明清时的天主教和科学翻译，三是清末民初的翻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翻译实践又经历了第四次高潮，“与前三次翻译高潮相比，这一次涉猎的领域之广，从事的人数之众，译著的数量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张景丰，2002）。回顾对比我国翻译史上的四次高潮，有两次发生在晚清以来的百余年间，且在很多方面这两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都有类似之处。比如都发生在社会转型期，而且对翻译的需求来自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数众多，翻译活动满足着不同的社会实践目的与翻译受众的需求。翻译活动的影响向社会生活纵深渗透，翻译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参与塑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模态，深刻地影响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语言、艺术等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绝不像以往那样局限在宗教或科学等一两个领域。

后两次翻译实践高潮在时间上相继,除了短暂的间歇期外,几乎形成了连续体。这种态势产生了很多独特的翻译现象。仅从文学翻译的范围看,我们发现一百年间的外国文学翻译,在译本的选择、翻译标准和翻译规范的形成与更迭、翻译形式的厘定、译者主体的作用、中国现代翻译理论的形成、翻译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互动、翻译与现代汉语的变迁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独特性。林林总总的翻译作品呈现了纷繁复杂的翻译现象,需要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考察和解释。而两次翻译实践的高潮相继发生在最近的一百年间,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翻译研究资源,也为我们细致地考察翻译现象,揭示翻译的规律性提供了便利,这也是本研究的缘起之一。

第一节 翻译行为研究的意义

尽管翻译历史悠久,但翻译行为却是一个新的概念。二十世纪翻译研究摆脱了前科学状态,并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学科地位,与翻译学的研究范式发生多次重大变化密不可分。在翻译研究范式的数度转换中,翻译研究的共核也逐渐显现,这个共核就是翻译行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西方翻译研究以及八十年代中期之前的我国翻译研究,主要采用的是语文学的研究方法,这一漫长的阶段,可以笼统地称为“传统的语文学派”翻译研究阶段(陈德鸿、张南峰,2000:ix)。这一时期的大多数翻译探讨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围绕一些核心但同时又起着束缚禁锢作用的概念,如“忠实”与“自由”、“直译”与“意译”的二元对立主题,作此消彼长的反复争论。译本与原作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核心,译论多由翻译实践的参与者发表,注重讨论翻译技术手段运用的合法性,强调经典文学翻译时译者艺术天赋和感悟能力的重要性,经学翻

译时“忠实”的必要性。按照 Steiner (2001:319) 的观点,这些对立的主题区分“完全是偶然的,既不准确也没有哲学基础”,且呈零金碎玉的状态,缺乏现代语言学或文艺学理论的那种系统性,也就很难称得上是系统的能够呈现完整理论框架的翻译理论研究,对翻译行为本身缺乏必要的研究和科学的认识。正如 Gentzler (1993: 43) 所说:“人们从事翻译实践,但他们并不清楚实践的到底是什么。”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随着翻译研究走向了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道路,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不断涌入,翻译研究才真正演进为一门学科。“翻译行为”逐渐成为翻译研究最重要的切入点之一。

简要地审视、回顾传统翻译研究走上现代翻译学的历程,就不难发现行为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影响作用,翻译行为研究又是如何成为当代翻译研究焦点的。

语文学研究之后,随着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的关注,翻译研究走上了科学的研究的道路,开始具备一门现代学科所具备的基本条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哲学、文艺学等多门学科形成了对翻译问题的集中关注,这些学科自身多多少少出现了翻译研究转向,它们的学科理论和思潮也影响了翻译研究的发展。概括地说,它们为翻译学提供了不同种类的行为类型,同时也在发掘着“翻译行为”的本质,来自上述学科领域的各种“行为理论”影响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翻译研究。

首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基于各类语言学理论的翻译研究方法兴起。“(我们的)语言观和谈论语言的方式决定了我们的翻译观和谈论翻译的方式,比如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理论、生成语言学的理论等都与相应的翻译模式或翻译观、谈论翻译的方式有关。语用学也是如此,八十年代初,话语处理作为久未探讨关注的问题成为研究的课题,翻译研究也随之变化。由于有了这样的语言观,

我们对翻译、翻译行为、翻译过程和翻译策略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Kohn,2003:22)译者的语言行为成为语言学翻译研究的焦点。语言学的翻译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译本的各个语言层级中表现的译者的语言行为(linguistic behaviour)。在语言学的翻译研究中,译者的语言行为与译本的语言是一体的,译本的语言是译者语言行为的表征,因此,在翻译研究的语言学研究时期,研究者并没有刻意去区分语言与语言行为,因此从研究的表象上看,语言学的翻译研究似乎关注的仅仅是语言问题。

而随着翻译文化转向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渐次展开,研究者开始从社会关系的维度看待翻译问题,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也逐渐对翻译研究产生影响。翻译行为为何发生,受控于何种因素,受制于何种规范,产生了何种影响,带来了何种变化……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能到文本中去寻找答案,不管是采用语言学的方法还是语文学的方法。人们开始把视线投向翻译行为以及翻译行为发生的社会、文化、历史等背景上,社会学的行为理论也逐渐凸显了它对翻译理论的建构价值,翻译行为作为一种研究的概念得以彰显。在翻译研究领域内,呼唤进行翻译行为研究的声音日渐增多:“人们越来越清楚翻译不是抽象的对等游戏,它不能脱离社会情境中人的行动”(Robinson,1997:25);“理想的翻译研究应当研究实际的翻译行为,应当描写译者对翻译情境中可变量的各种反应,最后,翻译研究应当解释作为翻译情境的功能的实际的翻译产品(目的语文本),解释作为对翻译情境的反应而实施的各种翻译行为”(Neubert & Shreve,1992:8)。七八十年代,伴随着对翻译行为的关注,行为理论成为多家当代翻译理论的基础,正如 Wilss 所说的那样:“翻译研究很明显已经摆脱了它的两个早期阶段,即神学与形而上学理论阶段的束缚,进入第三时期,这一阶段本质上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同时显示了行为理论日益强大的影响力。”(Wilss,1996:2)

在走过了语文学的前语言学研究阶段和语言学研究阶段后，当代翻译研究实现了研究维度的一个重大转化，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即社会—文化的研究空间和视角，翻译被强调为发生在社会世界的人的行为的一种，从而摆脱了既往研究静态、机械的研究模式。关于行为的各种理论、概念顺理成章地被借用过来，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以及新的理论起点，影响了多家翻译研究流派。这里既存在着人们耳熟能详的目的行为、规范行为与翻译理论的结合，也存在交往行为、政治行为、社会行为、语言转换行为、言语行为、解决问题的行为等概念在翻译理论研究中的应用。在这个意义上，行为理论诚如 Wilss 所言，对当代翻译理论影响巨大而深远。如何看待翻译，亦即将翻译理解为何种行为、采用何种行为概念，就成为形成不同理论间差异的重要原因。

九十年代，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翻译研究开始使用认知科学、心理学的方法探察译者的主观世界，开始探索翻译行为发生的心理过程。以 TAPs 研究为代表，翻译研究进入了认知研究的阶段（林克难，2006），翻译行为的认知控制是研究的焦点，翻译行为研究走向了与神经科学、脑科学研究相结合的道路，翻译行为被视为特殊的双语认知加工行为。翻译行为研究的认知转向，与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认知科学以及其他相关自然科学的进展密切相关。

经历了从语文学到语言学再到文化研究、认知研究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转换，翻译行为研究逐渐成为翻译研究的焦点，并且围绕着这个研究焦点，逐渐拓开了翻译行为研究的三个不同维度：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心理世界（袁辉、徐剑，2011）。翻译行为在当代翻译研究中不仅是重要的翻译研究课题，同时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在翻译理论研究中也将凸显其价值。

第二节 出场、差异、合理性： 文学翻译行为的三个存在结构

毋庸置疑，翻译是有其时代特征的。每个译本多多少少地都带有它那个时代的印记，而当我们总览过去一百余年的文学翻译时，翻译的时代性显得尤为突出，一个具体体现就是文学复译行为反复发生。抛开细致的翻译行为和文本特征不谈，宏观地看，晚清以来最直观最普遍的文学翻译行为或许就是复译了，一部外国作品有可能被翻译多达数十次，而且这种现象相当普遍。翻译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其地域性。翻译之所以成为文学和社会需要，翻译行为之所以发生，除了时间距离使得文学作品必须借助翻译来延续其文学名声与生命外，文学作品需要在不同地域间传播也是一个原因。翻译中语言的转换只是这个变化的载体，时间、空间的变化是文学翻译行为发生的基本条件，而译者翻译行为的合理性则决定了翻译最终能否达成、以何种形态达成。为使讨论更加具体，我们不妨以复译这一独特的翻译行为来论述文学翻译行为的结构，以便为我们具体研究晚清以来英美小说的翻译行为提供一个基本的方法论。

晚清以来英美小说翻译中有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现象，就是复译行为高频地发生。复译，旧时区别于重译，现与重译通用，指对同一外国文学作品的再次或多次翻译，它既可以指不同译者对同一原作的翻译，也可以指同一译者对同一原作的翻译。复译的必要性在国内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茅盾，2009；许渊冲，1996；许均，2003；辜正坤，2003）。三十年代时鲁迅（2009：68）就曾为复译辩护，提出“非有复译不可”，时隔六十年后罗新璋（1991：29）又重新指出“翻译完全可以有定本”，复译的必要性成了国内复译研究最大的本原性问题。国外的研究更加关注复译的动因，必要性并不

是争议话题,这是因为很少有人认为不需要复译(Almberg, 2001),人们认为文本不是静止不动的语言标本,不存在完美的翻译定本(Snell-Hornby, 2001),文学作品差不多每三十年就需要复译一次(Schulte, 2001)。在众多的复译动因中,社会环境和翻译规范的变化被认为是最主要动因(Brownlie, 2006),其他动因还包括译者由于个人经历发生变化,对自己较早的译本进行修订重译等等(Baibikov, 2010:74)。我们认为,文学复译作为一种独特的翻译类别,其必要性、发生的可能性以及译本的存在方式都是由文学翻译的内部循环结构决定的,只有理解了这种存在结构,才能够更好地洞察、理解晚清以来英美小说翻译行为。

这个结构包含三个核心概念:出场、差异、合理性。

郑诗鼎(1999:43)对复译的外部动因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

① 随着对经典名著的研究不断深入,当人们对它们的认识经历了由表及里的升华之后,便会发现旧译对原文的理解有欠妥或不当之处;② 随着对不同语言的对比研究不断深入,人们对各种不同语言的规律有了新的、更深刻的、更接近事物本质的认识,用这种新的认识去审视旧译,自会发现旧译还需要改进,原来认为无法用译语表达的东西,现在可以找到理想的、恰当的表达形式了;③ 随着语言和翻译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人们难免会从不同的角度对旧译的处理提出不同的看法和见解;④ 随着语言自身的发展变化,为更好地适应变化阶段各个时期的译语读者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期待,需要对旧译进行调整和修改。除此之外还可能有其他原因,甚至还可能有应出版社之约,定期赶译的。

上述外部动因是客观存在的。作为外源性动因,它们虽然可以引发具体的翻译行为,但却无法解释翻译行为是否有存在的合理性。换言之,外源性动因不是复译自身的存在结构决定的,无法对复译的存在结构和内在逻辑做出清晰的解释和说明。

我们认为翻译行为是产生于某个特定“场域”中的原本,以不

同的译本形式在不同时间与(或)空间的场域中反复地“出场”,无论是复译还是其他类别的翻译都是特定场域中译者“合理性”的翻译行为,是原著以差异化的形式存在的方式。这个定义关涉“场域、出场、合理性”等核心概念。“场域”泛指人类活动(包括翻译活动)的历史舞台。场域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时间、空间决定不同翻译事件发生的场域也不相同。“出场”是借自舞台艺术的隐喻,指某种思想或主体在特定历史场域中的出现(任平,2008:42)。从场域与出场关系的角度看,初译是原作以翻译本的形式摆脱遮蔽状态进入某个特定的场域,复译则是原作以不同的译本形式进入与初译不同的历史场域。场域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决定了翻译活动发生的场域不是静止恒定的,时间、空间的变化会导致场域的变化,旧场域会演变为新场域,或切换至另一个全新的场域,场域变化是原作以不同译本出场的前提。

初译本是旧场域中的出场者,它在场于旧场域。由于适配性的原因,初译本在新场域中无法继续在场,场域变化迫使已出场译本“退场”,并形成新场域中译本“缺场”、“空场”的状态。原作必须以新的译本形式重新出场才能在新场域中继续保持在场,其作品生命才能得以历时延续。因此,出场与在场的循环,是文学作品维持和传播文学名声,延续文学生命的要求,原作在“场域”中的“缺场、出场、在场、退场”状态决定了复译的必要性。

翻译文学地位最高或翻译活动处于高潮的时期,最能说明译本在场域中出场的逻辑。Even-Zohar(1990:47)曾在多元系统论中论述了翻译文学占据主导地位的三种情况:“一、当年轻的文学处于起步阶段,一开始会向成熟的文学学习现成的模式;二、当某种文学处于边缘或弱势地位时,会引进本身所欠缺的文学形式……三、当一个国家的文学史上出现重要转折点,公认的文学形式已经无法满足需求,或出现文学真空,没有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学类型时,外来模式就很容易取得主导地位。”上述三种情况有一个

共同点，就是译入语文学系统中出现了文学空位，译入语场域中出现了缺场、空场，这时候外国文学作品开始以翻译文学的形式出场填补空位。五四时期之所以发生大规模的翻译并出现大量的文学复译，原因即是如此。它是外国文学作品以不同的翻译形式在变动的场域中保持继续在场的路径。文学经典要实现在已变化的场域中永恒在场，不停翻译、复译是一种实现方式。

我们简要地以《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不同时期的四个代表性翻译为例，说明这种出场与在场的循环。

《鲁滨孙漂流记》的代表性译本及其历史实践场域

实践场域	晚清至民国初年	五四至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
年代	1898	1919~1949	1949~1979	1979—
译本	林纾、曾宗孔 (1905)	徐霞村 (1934)	徐霞村 (1959,修订再版)	郭建忠 (1996)

这些译本分布在四个大的历史场域中。通过语料库手段的对比研究发现，四个场域中的复译本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比如从翻译语言来看，晚清至民国的实践场域中译文使用的是异质潜行的弹性文言；民国至新中国成立的实践场域中译文使用的是形式化特征明显的欧化白话文；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场域中译文开始去形式化，译文以通顺明晰的现代汉语书面语为语言规范；改革开放后的场域中，译文进一步回归汉语传统，译文通俗易懂(王琴、徐剑，2010)。另外，历史实践场域对译本提出了不同的功能要求，以译本序言所陈述的翻译目的为例，第一时期的林纾等人希望通过翻译鲁滨孙启迪民智、“激励少年”(葛桂录，2004:119)，这与晚清有识之士探寻强国之路的政治抱负有关。三十年代徐霞村的译本宣称以系统译介英国文学为目的，也是顺应了新文学运动以

后，大规模译介外国文学以为模范的文学要求。而五十年代末修订再版的徐霞村译本，其序言中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占据了主导地位，翻译服务政治的功能得到加强，充分显示了翻译的政治性。改革开放后郭建忠的翻译动因更加多元，涉及文学译介、社会意识形态评介、翻译技术探讨、语言与文化取向等众多因素，改革开放的时代包容性与译者包容开放的心态都在翻译和译序中得到彰显。因此，复译是变动的场域对新译的要求，译本是原著以差异化的形式保持持续存在的方式。《鲁滨孙漂流记》在不同时期的每一次翻译都是为了达成不同实践场域中的不同翻译目的。当中国的实践场域发生历时变化时，旧译本在新场域中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和地位，旧译本退场。新的实践场域需要《鲁滨孙漂流记》发挥新的功能，于是原著便以新译本的形式在新场域中重新出场并保持继续在场，从而实现出场与在场的循环。

因此，译本是原著实现在特定场域中出场、在场的方式，复译是原著实现在变化了的场域中继续在场的方式。外国文学是否需要翻译或者复译，取决于场域中是否有原著出场、在场的需要，原著是否需要以翻译或复译的方式在场。“场域”与原著的“缺场、出场、在场、退场”状态决定了翻译的必要性，出场与在场的循环是文学翻译的内源性动因。

为了保持在变化了的场域中持续在场，原著需要以翻译的形式反复出场，这是出场与在场的循环。而保持翻译的差异，并在各种差异化的翻译中保持同一性，则是文学复译的“差异”与“同一”的循环。

文学翻译的“差异”与“同一”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同一性可以从译本与原作的同一，以及译本与译本之间的同一两个方面认识。译本在场于特定的场域，在相对静止的场域中作为原著化身的译本，保持与原作的绝对同一性。但是，场域会在时间、空间的运动中发生变化，旧场域会演变为新场域，旧场域中的译本能否在变化